

Hong Jun Zhuan Zh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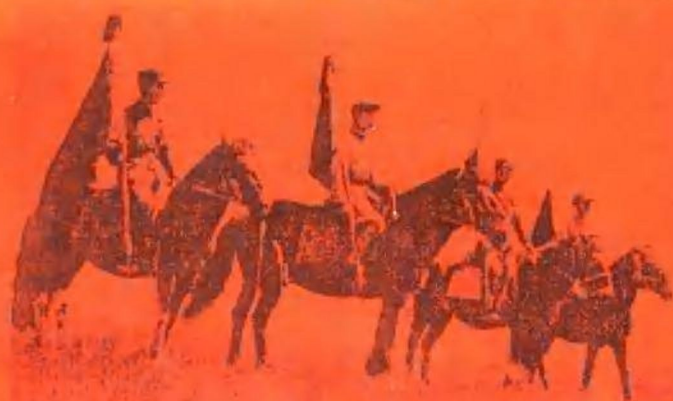
Yun Gui Chuan

张家德 著



紅軍

轉戰雲貴川論集



云南大学出版社

264.4
2
2

B57.117

Hong Jun Zhuan Zhan

Yun Gui Chuan

张家德 著

紅軍

轉戰雲貴川論集



云南大学出版社
963207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滇新登字07号

责任编辑: 赵国树

封面设计: 张 恕

红军转战云贵川论集 张家德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校内)

云南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63 字数: 280千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 - 1500册

ISBN 7-81025-195-3 / K·46 定价: 6.50元

鲁 序

《红军转战云贵川论集》一书的出版,使我又回想起长征路上一些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工农红军长征,至今已近60年。转战云贵川时,我还不满24岁。回首往事,令人感慨万分,壮怀不已。当时,我在红5军团第38团任营长,董振堂是我们的军团长,陈伯钧是我们13师师长。红军撤离江西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红5军团一直担负殿后任务。我所在的营,是殿后的殿后。

1934年10月15日,我们营奉命连夜撤离了在兴国的红军的最后一个阵地。突破湘江,是一场血雨腥风,惊鬼泣神的悲壮凯歌。湘江一战,冲破了敌人布下的罗网,当师长陈伯钧于湘江西岸出现在我的面前,要我接受新的任务时,回首望去,我发愣了,全营只剩下了17人!此刻,使我联想到近来迭次失利和总参谋长刘伯承被贬到红5军团当参谋长的事件。第五次反“围剿”时,因为刘伯承不同意李德的消极战法,支持毛泽东同志的运动战,遭到不公正的对待。血的教训已经成为历史,渡过湘江之后,红军往那里去呢? !这是红军广大指战员迫切急待的答案。12月11日,红军攻占了湖南通道县,中央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了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15日占领贵州黎平县城,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了会议,在周恩来、朱德等多数同志的支持下,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通过了放弃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原定计划,继续向敌人薄弱的贵州挺进。这次会议之后,刘伯承同志又被请回去重任红军总参谋长。

遵义会议之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营一级干部不仅经常能了解一些敌情,也能了解到我们的一些战法。我们撤离遵义城时,

红军总司令朱德签发的命令，由军团直接下达到我们手里，印象之深，至今还能背诵命令的全文。扎西缩编后，红军轻捷灵活，神出鬼没。四渡赤水，再克遵义，威逼贵阳，巧渡金沙江，再现了红军的神威。在一次战斗中，军团长董振堂为了打掉敌人的威风，亲率大刀队，大杀回马枪，把“双枪兵”和中央军打得落花流水，被当地群众传颂为神话般的革命故事。

红军的革命英雄行为，“是由他本身早已具备的英雄气质所决定的”。那么，一个人又如何具备这样的英雄气质呢？以我自己的战斗生涯总结为这样一句话：胸中有党，有社会主义信念，为人民谋福利，忠贞不屈。这种精神就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去年出版的《从马伏到将军》一书，以我的亲身经历，阐述了这样一个真理。今年云南教育学院史学副教授张家德所著的《红军转战云贵川论集》，从理论上来研讨这段光辉的历史，很有意义，也很感人；她既具有理论研讨，又具有革命史实的双层意义。我建议年轻的朋友和同志们，不妨参照着读一读，从中领略红军长征永放光芒革命精神！红军转战云贵川是长征途中最关键、最活跃的时期。这个阶段是中国革命的转折，它标志着我们党开始成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充分反映了毛主席英明正确的指挥，他决定着红军长征的成败。红军从通道——黎平——猴场转兵起，历经遵义会议、威信连续会议、再克遵义、四渡赤水、佯攻贵阳、调出滇军、巧渡金沙江等壮举，充分展示了长征中红军的英姿，也是毛主席周密运筹英明决策所赢得的胜利！《红军转战云贵川论集》探讨这一段历史的经验，对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丰富红军史宝库当有裨益。作为一个红军老战士，我从内心感到欣慰！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读到这本论集，也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活力和启示。红军打天下闹革命，推翻旧政权，是解放生产力，让人民生活得幸福；今天，小平同志设计的改革，也是要解放生产力，让

我国人民群众早日过上更富裕的生活。过去，闹革命打天下英雄辈出；今天，搞改革发展生产，也会涌现出一代新人——强手！

祝愿长江后浪推前浪，代代新人在成长！

鲁瑞林

1992年3月于北京

注：鲁瑞林同志历任红军营长、师政治部科长；太行军区二分区司令员、太行军区司令员、十三纵队副司令员、六十一军副军长、六十二军政委；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谢 序

张家德副教授《红军转战云贵川论集》，是目前国内系统研究红军长征过云贵川地区军事历史的少有的重要著述。论文和文章绝大部分是已经发表过的，亦有少数尚待发表。虽然这是一本论文集，然而由于论述集中、深入，事实上已构成一部专著。

论文及文章材料丰富，基础扎实，既有档案和文献材料，也有调查资料，并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对红军长征过程中的若干重要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富有学术性和创造性的研究意见，如对遵义会议的分段、四渡赤水战略目标的变化、扎西会议的考证和论述等，都很有启发。文章构思严密、逻辑性强，叙述清楚。

此书的出版，对于研究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以及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历史等问题，都是很有意义的，可以作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近代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辅助教材。

谢本书
1992年春节

注：谢本书，史学教授，云南省社科联常务副主席、云南省历史学会会长。

朱 序

《红军转战云贵川论集》系张家德副教授近10年研究红军史的31篇论文的荟辑。以学术性强、观点新颖，考据扎实而具特色的长征研究论集的问世，在我省还是头一次，在全国亦是各不雷同的第三个集子。

该书运用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包括革命历史档案，旧政权档案以及革命文献，还有作者实地考察的资料。因此，论出有据，考据扎实。

该书观点新颖。作者认为遵义会议应有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它由酝酿与准备阶段、会议召开与决议阶段、总结与胜利阶段等三个历史阶段构成。遵义会议“三段论”的提出，是近年全国史学界在有关遵义会议的研究中最具有突破性的贡献。对四渡赤水的战略目标，作者提出了区分总体战略目标，大战略目标以及不固定的小战略目标等层次的“金字塔论”，与作者提出的红军转战云贵川为寻求落脚点，开创新苏区的“落脚论”结合起来，对研究红军转战云贵川史的脉络，具有指导意义。作者论证了1935年2月五个政治局会议并非扎西系列会议，而是威信连续会议。作者考订了皎平渡江的准确时间是在5月3日子夜。这些都回答或解决了学术界长期探讨或争论的问题。《论遵义会议的三个历史阶段》、《也谈毛泽东“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战略决策的形成和目的》、《论红军长征时

期党在云南的民族政策与策略方针》等文都经云南省党史学会集体讨论审定并推荐参加全国或全省的学术研讨会,受到学术界的肯定。

该书代表了云南学术界在红军史研究的新水平,并把这一研究领域推向一个新阶段。建议支持这一学术价值较高的红军史研究成果尽快整理出版。

朱惠荣

1992.2.12.

注:朱惠荣同志为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云南大学出版社总编。

自序

历史上改朝换代，大都在农民大起义的暴风骤雨中出现。而农民大起义的铁流，有的在战略进攻中扫荡封建专制如摧枯拉朽，有的在战略转移中千里退却而悲壮覆灭。在无数次历史的重演中，以中国近现代史上太平军的失败与红军万里长征的成功，而最激动人心。这是我青少年时代，就读于四川宜宾中小学(东城分校、三中、一中)时，与史地、语文、体育老师和班主任、校长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启蒙及熏陶密切相关。朱化昭、吴履和、汪洁操、黄选青、陈德香、黄海林、吴耀吉、高天化、刘德聪等老师的淳淳教诲和循循善诱，我至今不忘。可见中小学老师对青少年学生启蒙所付出的深沉的爱，是何等重要！正如江泽民近两年来在教育界座谈会上两次讲过的那样：“要对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中学生一直到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这确实是培养和提高青少年学生思想认识和陶冶高尚情操的必由之路。

众所周知，因为忘本与腐败、内耗，从而导致太平军的夭折。那么，红军长征2万5千里获得史无前例的伟大胜利有何内在因素与外部条件呢？铁流长驱十二个省(含青海)，又有哪些悲壮与艰苦历程呢？……由于中小学五十年代的革命传统教育激励人心，使我带着这些问题求索，进入云南大学历史系深造。云大图书馆、省图书馆、省档案馆都近在咫尺，令人无不如饥似渴地饱览群书及档案，摘抄资料废寝忘食，眼镜换了一付又一付。这里要深深地感谢张德光、李德家、李埏、李为衡、董孟雄、谢本书等老师和省图书馆苏时斋老先生的悉心指导和大力帮助。“坐冷板凳”历经几载，搜集了中国共产

党在东南亚活动及红军转战云贵川的两项专题资料，约计50余万字，这就对我毕业后进行探索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可惜我们1963年毕业分配太不对口，大学里多读书的“白专”帽子铺天盖地，象阴魂一样在极“左”年代丧失天良；我把全部业余时间投入研究，研究的又是我们党与红军光荣奋斗的历史，不仅使用史料障碍重重，还被诬之为“不务正业”，森严地判定这是“资产阶级个人奋斗”！

小平同志拨乱反正，不仅指示“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专长，用非所学不好”，“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而且还反复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甚至还声称知识分子“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这正是拨去了积重难返的极“左”阴魂，中华大地的知识界重新获得解放。这册《论集》，可说是历尽辛酸的坎坷后，在这个新时期中的产物这一。它荟辑了笔者已近不惑之年的1981年到1992年公开发表的40多篇论文中的代表作。这仅仅是作为我弥补近20载光阴的损失，向新时期的第一份献礼！向生长我的家乡与启蒙我的母校及师长答谢！向深造我的第二故乡云南与母校及师长回报！

这个《论集》没有重收1988年版《红军长征大事文集》中的八个篇目。故本集中的篇目，只有个别未曾公开发表或今年发表，有的篇目是经云南省党史学会集体讨论审定、代表云南参加全国同类学科学术讨论会交流。如《论遵义会议的三个历史阶段》，参加“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交流；《也谈毛泽东“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战略决策的形成和目的》，参加西安——延安“纪念红军长征会师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交流；《论1935年滇军援筑》，参加广州“西南军阀史研究会第三次学术会议”交流；《论红军长征在云南的民族政策与兄弟民族对长征的伟大贡献》，参加贵阳“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学术讨论会”交流；《论红军长征时期党

在云南的民族政策与策略方针》，参加“云南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交流。而且不少篇目是作云南教育学院历史教育系本科、专科的中国现代史专题讲座的教材，经过五年多的教学实践，由于它紧密地结合着革命传统教育，遂受到学员们的普遍欢迎；欢迎它实事求是、观点新颖、学术性强。

但《论集》各篇刊出时间跨越十年之久，学术界新资料、新论点层出不穷，虽经粗略修订，匆匆之中难免仍有疏漏、不确之处，敬请识者不吝指正！

这本《论集》的出版，得到不少同志的大力支持，特别是鲁老作为红军时期的革命前辈，在百忙中还为此书作序！而云南教育学院科研处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朱惠荣、赵国树、刘自文、秦宝喜、董嵩寅、杨厂生、程昕等同志亦鼎力相助。谨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张家德

1992年1月3日

红军转战云贵川论集

(目 录)

鲁序	(1)
谢序	(4)
朱序	(5)
自序	(7)
论遵义会议的三个历史阶段	(1)
四渡赤水战略目标新议	(15)
中央红军一进云南原因初探	(35)
论1935年滇军两次入黔	(48)
堵截中央红军长征的沿江川军兵力质疑	(59)
论川军1935年堵截中央红军的南路部署	(63)
论古蔺石箱子会议的历史地位与毛泽东思想	(75)
试论中央红军转进扎西的历史功绩	(88)
扎西会议新考	
——与程中原、张子明共商	(98)
威信“鸡鸣三省”会议若干问题考辨	(111)
扎西会议再考	(122)
再论扎西会议的历史意义	(131)
遵义会议后川滇黔游击战争	(142)
试论川南红军	(152)

论古蔺白沙会议的历史地位	(162)
也谈毛泽东“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战略决策的形成和目的	(175)
《红军长征在四川的战斗历程》有关问题的商榷	(185)
重走红军长征路论中央红军二进云南的战略目标	(191)
滇蒋合力堵截中央红军第二次进云南	(208)
红九军团占领会泽及渡江日期的考证	(223)
禄劝小仓街5·1决策功不可没	(230)
中央红军皎平渡口5·3子夜渡江新论	(244)
红军长征时期云南的后方防范	(257)
中央红军转战云南大事记	(270)
红二、六军团回旋乌蒙起因初探	(280)
红二、六军团一进云南考略	(288)
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之普渡河战役	(301)
论滇军1936年初堵截二、六军团西进	(311)
红二、六军团转战云南大事记	(322)
论红军长征时期党在云南的民族政策与策略方针	(336)
论红军长征在云南的民族政策与兄弟民族对长征	
的伟大贡献	(350)

论遵义会议的三个历史阶段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四年之久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红军和党内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从而开辟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航程，成为历史性的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具体表现为下述三点：即中国革命的道路，由“左”倾教条主义，从此转到了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由挫折、失败，从此开始转向战略上的主动，并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红军和党的领导，从此转变到有了正确的新的领导核心，并且开始成熟。这一系列的伟大转变，才是完整的遵义会议精神。这个会议之所以十分完整，并不单是在遵义召开的会议期间所能全部解决的，而是通过了非常曲折的若干历程才得以全部实现。这就是说，完整的遵义会议，是以会议的召开为主体形成的。因此，笔者试图从会议的酝酿与准备、召开与决议、总结与胜利这三个历史阶段来分别阐述这一特征。

一、酝酿与准备阶段

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在1934年至次年的跨年之交，有三次重要会议的召开，即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三次会议的实质，虽然都集中反映在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上，但是，这个问题

早就从老三界一直争论到黎平，猴场会议应该是它的丰硕的结果，其中，在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①。为什么定这样的上限呢？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利，与四次反“围剿”的实际情况相比之后，广大红军指战员已逐渐滋长了改变领导的情绪，这必然反映到争论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上。而七天七夜的湘江战役，红军又付出了多么惨重的血的代价，因此湘江战役既是指战员们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的顶点，也是遵义会议前思想酝酿阶段的顶点。周恩来指出，进入贵州前后，就“开始酝酿召开政治局会议了。”这就是说，从老三界起，红军内部出现了日益增长的思想情绪和问题的激烈争论，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是属于遵义会议前的酝酿阶段。以毛泽东为主的正确意见，在三个会议上都否定了李德的错误路线。特别是湖南通道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去薄弱的贵州的建议^②。

使疲惫的红军得到休整；否决了李德坚持要红军去钻蒋介石准备好的“口袋”。这就表明了通道会议的重要性。它避免了中央红军断送在不懂中国国情的外国军事顾问手里；而蒋介石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企图继续围歼红军的阴谋，第一次遭到了破产。由于放弃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建议，是黎平会议与猴场会议最后决定的。^③显然，红军长征途中第一次改变行动方向，是由通道会议酝酿，而在黎平会议与猴场会议完成，这就是长征中著名的首次转兵，即“黎平——猴场转兵”。学术界对于这一转兵，长期以来先有通道、后有黎平之说。笔者何以持“黎平——猴场转兵”之新议呢？因为猴场会议是李德在黎平争论失败大怒后，沿途仍继续激烈争论而召开的。当时中央的“三人团”有“处理一切”、统揽党政军的大权，李德则是“太上皇”，军委的一切工作为他一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博古在通道飞行会议上同意到黔境也是权宜之计，他准备由黎平附近再绕道去湘西。如果不召开猴场政治局会议再次作出“特有

以下新的决定”，李德与博古很可能利用独揽的大权，擅自向湘西行动。正因为这个关系，政治局在猴场会议上作出了一个明确限制“三人团”权力以改善军委领导的决议：“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获得通过才行。这显然意味着取消了李德对红军瞎指挥的特权。这不能不说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长征途中首次的组织上独立自主地采取了坚决措施，来保证红军正确的军事路线与战略行动方针的实施。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猴场会议的重大决定，它不但为遵义会议取消中央“三人团”以及改组中央领导作好了准备，而且这一决定影响深远。它是猴场会议的一大贡献。正由于有这一组织措施作保证，才完全摒弃了李德、博古还想争论去湘西安于现状的念头。会议坚持毛泽东去黔北转入反攻，以消灭追敌一部，创造新苏区的正确建议。所以猴场决议的前言中就有“我野战军即将通过乌江，跨进我们(1934年)12月18日(黎平)政治局会议所预定的新苏区根据地的遵义地带，开始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最后阶段。”这不仅重申了黎平决议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并且是不适宜的。”而且其战略目标，“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所以说，这就从此彻底杜绝了李德、博古再欲伺机回头去湘西的错误主张，并且进一步为遵义决议确定的总体战略目标铺平了道路。黎平与猴场两次会议，为了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都致力于纠正目前政治思想上所表现出来的“主要危险倾向”，坚决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的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危险，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与偷安的情绪；猴场会议还突出地在纠正军事路线军事思想方面有重要的决定，一是缩编部队与缩小军委纵队以免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二是不失时机的求得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有把握地取得胜利。两个会议均为遵义扩大会议“更认为这种军事上的